

新 清 华 文 丛

72061-53
453

和而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片论

解 志 熙 著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近年学术论文和学术批评的结集,共收 14 篇文章,分为两辑。第一辑“文学史论与作品解读”,所收文章或深入探讨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现代文学现象和作家,或细致解读一些现当代文学名作,有助于推进对现当代文学的理解。第二辑“方法漫论与学术批评”,所收文章或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一些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或从学科史的角度品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论著的学术得失,有益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片论/解志熙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新清华文丛/徐葆耕主编)

ISBN 7-302-05650-1

I. 和… II. 解…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 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7051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责任编辑: 马庆洲

版式设计: 肖米

印 刷 者: 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5650-1/I·43

印 数: 0001~4000

定 价: 22.00 元

出版说明

清华大学中文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复建伊始,即以整理研究清华人文学科历史为起点,探索学科发展道路。于是有《清华文丛》行世,凡 5 载共 8 部,为学术界所瞩目。1995 年纪念建系 70 周年、复建 10 周年之际,系内同仁以为,沧海桑田,今非昔比,新中文系应旧中求新,旧中出新。于是不揣浅聘,又有收录近年清华学人新作之《新清华文丛》吴献于学界同仁面前,以求晒正。吴宓学长曰,新未必比旧好,旧未必不如新。本丛书辑录之著作亦当作如是观。老清华人文学科以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为特色,在微观上谨严,宏观上开阔,谨守历史真实且有鲜明的时代新意。《新清华文丛》的诸书风格殊异,惟其志向即继承传统,以谨严科学之治学态度回答新学术课题。

《新清华文丛》第二辑由清华大学中文系主编,收入本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同人的有关论著。编委会成员为(姓氏笔划为序):王中忱、孙明君、何兆武、罗钢、徐葆耕、张岂之、黄国营、蓝棣之、谢思炜。执行编委:徐葆耕。

坚实的开掘与清醒的守望(代序)

孙玉石

新正时节,解志熙来我这里,谈了很久。他将这部书稿,即他近七八年来发表的论文的汇集,交给我,要我写篇序。他说:“我是学生,算是作个纪念吧。”我欣悦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因杂事缠身,一时无暇顾及,又不愿敷衍,草草了事,即拖拖拉拉地搁置起来了,整整经过了两个多月,迟迟至今才动笔。内心里,我始终是有一种欠账的不安之感的。

解志熙与我,也算是同行与朋友了。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家炎兄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就曾多有交流。对于他的勤苦,他的才华,他的冷静与沉实,他的成绩和潜力,我是很欣赏的,并有更大的期待。做系里行政工作那几年,我曾经与一位不那么满天飞来飞去,非常关心学科建设的学校领导,磋商“谋划”,也与志熙自己,多次提起,要将他留在系里。后来他为了不辜负刘增杰先生的栽培,还是回河南大学了。我一直为此事感到可惜的。他的博士论文《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出版的专著《美的偏至》,他已出的论文集,以及这里收入的一部分散见的论文,或粗,或细,过去大都是看过的。有的文章,颇引起我的一番深思。有的文章,他能在一种理论风气中,说出一些与之相左,别人想说而不愿说的话来,曾经引起过不同的反响。这些,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为人与为学的认识。记得一次因病住

院,有机会进入沉寂思考的情境里,我读了他的一篇发表在《中州学刊》上关于审视文化批评现象的文章,不仅颇有同感,还为他的敢于直率说出自己观点的学术精神与品格,对老一代,对同龄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学生在内,而曾经动情过。

事隔多年后,将这本论文集的一些自己熟悉的或陌生的文字,我认真地读了一遍,在领略解志熙的诸多学术见解与学术发现的同时,仍然觉得还是能够从中大体上看出一些他的为人、为学、为文的风貌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这块土地上,一个年富力强的长于沉静思考的学人,一个坚实的学术开掘者与清醒守望者的形象,似乎又于这些清晰而又漫漶的文字之上浮现了。

这一点恐怕是同行学人大都承认的事实:解志熙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走的是一条非常严肃而坚实的路子。这坚实的主要依凭,是来自他在研究中始终注意于大量原始资料的搜寻阅读与独到的理论发现的结合。他的治史意识非常自觉,也就是说,他主张并努力实践,把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引进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始终坚持一种科学性的学术规范。他曾引西方学人的一句话“回到常识”。其实这正是一种做历史研究这门学问的“常识”:作为文学历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不仅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历史的品格,而且也要求这门学科的研究者,要有一种坚实的历史研究意识和方法。处理好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的结合度,就是一个关键。一个并非以史料整理为主的研究者,没有独到的理论思考与发现,就会陷于史料汪洋大海的沉溺与整理中,甚至因此而不能自拔(史料的沉溺与整理,当然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但作为一个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仅仅这样就远远不够了);但没有搜阅和发掘史料的艰苦工夫,不将理论思辨的抽绎置于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自己的研究结果,也就可能成为一种主要在臆想中运行的崇弘议论,往往会徒然挥霍自己的才华而

失去历史研究者的宝贵品格。这虽然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老话题,但在前些年里,或者即使是在时下仍然流行“快餐文化”的风气下,要真正做到,还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也就是20世纪一些著名学术大师们所竭力开拓创建的,我们的老师一辈的学者们所躬行实践的方向:怎样在敏于接受西方现代的理论与方法形成自己学术研究的新路中,引入有清一代朴学家们所凝聚的“科学的古典主义”(梁启超语)的精神和方法,既坚持艰苦的搜阅史料的工夫,又葆有活跃的理论思考的能力和空间。解志熙这些年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他在史料发掘与搜寻方面所下的工夫,在他同辈学人中间,即使不为最先,我想也应该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他的关于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及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从这个新的视角对于冯至先生诗学思想与小说创作的论述,所以能有令人信服的学术发现与为人们认同的论析,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坚实性与突破性的学术价值,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接着所做的另一项工作,即探讨为人们长期所忽略或轻视的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唯美—颓废主义这种“偏至之美”,对这一复杂而棘手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以来还从未有过的发掘、清理、辨析和审视,从而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开拓性,也突出地体现了史料发掘翔实和理论阐释新锐结合的特点。这本书里开头收入的两篇论文,是他为那个课题所撰写的专著的两个部分,当时或因篇幅被关系抽掉,或曾作为论文有所补充后另行发表,都可读出与那本专著一样的特色来。《“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一文,用力发掘并考察了波特莱尔、王尔德、邓南遮、谷崎润一郎等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的影响。有的,人们过去有涉及,但他做的更加完整。有的,是他第一次做了发掘与

梳理。读了之后,确实感到他是下了真工夫、苦工夫、笨工夫,工作做得深入细致,颇富功力,也以建立在这些史料基础上的论证,打破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对于这个潮流或现象的传统观念,可以说扎扎实实地填补了一个学术研究的空白。他的研究,常常能在文本阅读与史料追踪的交织中,使自己的论述,自然地显出一种纵横捭阖,析理绵密的特点。他论述田汉早年几个剧本时,指出他在现代文学作家中,是受唯美—颓废主义影响较大而且甚久的一位,同时又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田汉是以浪漫的态度来接受和改造唯美—颓废主义的。《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种改造或综合的结晶。但他有时又兴之所至,也能创作出纯然唯美—颓废情调的作品,《古潭的声音》就是一例。解志熙在原始的文学刊物上,努力发掘出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包括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充实和加强了自己论述的丰富性与扎实性,也为还原文学史的真正面貌,做出积极的努力。如《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王统照的七幕剧《死后之胜利》,就是由于他从这个角度所做出新的发现和论述,而更加突现于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我自己因为较早开始研究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潮,过去也翻阅和接触过这方面的许多材料;在我关注下吴晓东撰写的博士论文《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解志熙在这个领域里面所做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史料搜阅和理论思考的结合所下的力气,所达到的认识广度、深度与水平,却是远远超越了我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努力的范围的。

与上一篇讨论相同话题的,还有《寻找轻松——中国现代趣味主义轻文学思潮论略》,也是读了许多原始材料有所发现而写成的。只是与前文比较起来,更多了些价值判断,在坚持文学的时代良知与社会情操,对于趣味主义的轻松文学进行直言批评的同时,有些分析论断就不免失之苛刻与狭窄了。如说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趣味主义的轻松文学——趣味小品,“满足了作者

自我消遣、避重就轻的心理需要，也满足了许多渴求轻松的趣味消遣的小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需求。”这样对于一种文类在读者接受中引起颇大反响的分析，当然大体不错，但从当时的文艺创造和读者接受的美学心理与多样需求来看，社会学视点与阶层的分析似乎还是狭窄了一些。又如文中说，朱自清“所谓散文小品‘从言志转到了幽默’，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由唯美化的美文到趣味化的小品的蜕变。”这个类比性的论断，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可以推敲的。但这样的论断所以会令人产生犹疑，问题恐怕也在文章的史料丰实性与论述的充分性，怎样很好结合，还做得不够到家的缘故。

谈到史料这个老问题，我想起解志熙攻读博士时候的同窗李书磊的一篇文章。大约 20 世纪 80 年代，他曾在一个报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里面，深刻反思那个年代里的许多青年人，不读中国文化的经典，不读现代文学原作，不读原始杂志和报刊的第一手资料，读的大多是一些市场上流行的文学“选本”，作为自己的文学素养的来源，并以此着手进行学术研究。他称此种情形所造就的青年，为“选本文化”所养成的一代。我当时很赞同他的出于学术良知的慨叹和批评，极力倡导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要多读一些原典。然而，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了，现在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多大的改观，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梁启超说，凡一学术发达，“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方法，大加整理”，其贡献于我文化者不少，且“饶有科学精神”。（《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始终不无夸张地强调发现新的史料与新的字义的意义。现在的许多博士论文，甚至一些著名学者和名人，也不去读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的原初版本，不去读当时杂志或报纸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去努力发掘和发现别人所没有发见过的新的史料，也不去注意原有的史料，在当时历史影响大小与否，作家后来有无修改，即使

没有修改,也不大注意如果一些重要文章,注出当时发表的时间和出处给予人的历史感和学术价值感,与引自当下流行选本或“资料汇编”,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曾见到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分量很重的纪念巴人的论文集里,有一位并不算年轻的学者,在论述巴人的鲁迅先生研究成绩的洋洋洒洒上万字的论文里,几十条的引文,文末竟无一例外地全部注释为: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一书的第几页。在一部相当有见地的近代诗歌史的研究专著里,涉及一些大诗人的许多重要史料,所注的出处,不是诗人的原始文献,却大多是近年学人所编某某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实际上,这些史料都各有出处,而非《研究资料汇编》所惟一收录者。有的博士论文,重要的论述却只依靠后人近年回忆录提供的记忆材料,作为确证与根据。有的博士论文,近在身边的原始文本,不去动手查阅,非要转引而再转引自台湾及域外学者专著里的注释,“出口转内销”。有的博士论文涉及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的引述材料,不去看原始期刊发表的文章,却顺手依据近年刚刚出版的本子,而这个本子将很多涉及当时或后来看来不妥,或与健在今人有碍的观点,都已经做了删削和修改,非本来的面貌。一些经典性的作家和理论文字,明明有非常权威性的《全集》出版,却不去花一点工夫寻找翻阅,而只是随手引述身边所存的一些不完全可靠的“选集”、“全编”、某某作家“论创作”一类的坊间文本。这些在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规范中绝对不能允许存在的现象,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却是随手可得,而且在一些学者与研究生看来,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曾告诉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一定去翻原始材料,论文要注出原始出处,不能一卷《资料汇编》在手,可写天下文章。”他们有些人听了还颇不以为然。由此,看到解志熙如此重视原始文献和学术规范,于欣慰之余,更痛感研究界轻忽文献、游谈无根、投机取巧、不守规范之风的流行,几乎到了不觉为“弊”的麻木程度,有害青年培

养,有害学风建设,于学术规范确立,于学术的至深发展,极为不利,也深感解志熙在论文里提出的要用研究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考,是一个有很重要意义的呼唤。

解志熙在年轻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间,是属于善于理论思辨类型的一个。但是他不是一味浮躁地驰骋自己的思辨才华与论析能力,而比较注意文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关注,没有放弃对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深切感悟其中积淀的生活经验与文化情结。他对于一些经典文本,或被人忽略了的文本和作家,往往投以关注的眼光,用比较新颖的角度(如关注新文学作品中的旧文化情结等),或传统的视角,走进他们的世界。这里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结片论》及其他关于鲁迅《兄弟》等小说,关于郁达夫《沉沦》、《南迁》,老舍的《断魂枪》,以及于赓虞的论述的文章,都表现了这种文本细读和文本内涵发现性很强的追求。

他认为,鉴于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常常陷于刻意求深的玄谈或大而无当的概论,并且太看重作家公开的立场观念,而往往忽视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积淀在现代中国人生活经验中的文化情结及其在新小说家笔下情不自禁的流露,所以他的讨论将集中在具体而微的文本上,以便较为仔细地检讨这些文本所反映的生活经验到底积淀着现代中国人怎样的旧文化情结。他以为,明确的立场固然值得重视,但复杂的生活经验也不可忽视。因为一个现代作家即使在文化选择问题上高度自觉——例如他选择明确而且立场坚定并且爱憎分明,也未必意味着他在其具体的生活经验中就没有进退两难的困惑和爱憎交加的苦恼。他对于《弟兄》的主人公在个人主义的坚守与旧礼教的眷念之间的矛盾的揭示与把握,很有新意。他分析人身选择的困惑与价值分裂的苦恼,透过政治意义与形而上层面的“彷徨”而进入文化层面的“彷徨”的探讨。从这个角度,进入《沉沦》的分析,能够超越

个性主义与爱国情怀的解读，而进入新旧文化纠结的文化情结这个层面来进行阐释。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断魂枪》、《老字号》表现的知识分子为改造现实所进行苦苦寻求中对于旧文化的一往情深，目睹民族悠久美好传统失落后的痛定思痛的文化情怀，也能在已有的论述基础上，纳入一种文学的文化系统的思考。

现代文学史研究总是伴随着经典化的过程。这种经典化，包括一些经典作家与文学现象的不断认同与确立，也包括一些被冷落的“小人物”与现象的不断发现和被淘汰。解志熙对于后一面，做了很多珍贵的努力。他不放弃一些学术上一直被冷落不闻，或人们不屑一顾的角落，或被久久忘掉的作家，做着认真扎实的开掘与发现。或许因为事关河南乡贤，或是由于颓废—唯美文学潮流的涉猎，那篇论“恶魔诗人”于赓虞的诗与诗论的文章，考核了一个大多时候被遗忘的诗人的生平行藏，论述了他的诗学思想。这本身，就是这样努力的一个珍贵的实践。它的产生超出学术课题本身的发现与论述的意义，而在于实践“重写文学史”中如何打破旧有的框框而拓宽文学对象选择的历史视野问题。即使是脱离开文学史的写作范畴相关的问题，作为历史研究，怎样不要忘记那些为文学史作过努力的次要角色或“小人物”的独特贡献，也是一种观念的拓展与重建，补充与发掘。他考察一个对象并不沉迷或拔高对象。所以他指出自我开掘与自我执迷，恰好成为于赓虞诗歌得失的关键。

事实证明：文学史研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不断的沉淀中得到重写的。好的文学史应该不是历史现象的叠加式的堆积。大作家的浮出与小人物的遗忘，是文学史走向成熟的一个趋向。但是作为文学史的历史研究与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应该是有所差别的。这里想起一个史实。章士钊曾经写过一篇《吴道明案始末》的文章，里面讲的，就是小人物参与大历史的一段旧事。

吴道明，真名梁尔煦，少年时代是康有为同学，因见解不同，以至绝交。时隔五年后，两人相逢。交谈中，梁“大惊服”于康的变法学说，遂决意舍生追随。戊戌变法失败后，康亡命国外，梁亦陪同前往。梁的哥哥为盐商，家境丰阔，梁由此慷慨拿出许多钱，供康使用，直至其兄“私产匮尽”。为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当时康有为在海外募捐甚多。“保皇党人谋泄戊戌政变之愤，同时为向捐款的华侨设一开支项目，以塞众望而辟利源”，梁尔煦遂奉派化名吴道明到北京，开办照相馆，与当时光绪皇帝左右结交，要效荆轲、聂政，谋杀西太后。1906年案发，他被清廷处死。生前，康有为对梁尔煦非常冷漠，不给梁在京的活动经费，梁殉难后，其子前去拜见康有为，以商议善后，康居然拒而不见。章士钊分析了梁尔煦的“才疏意广，沾滞名利，不堪荆聂一流之除非大业”，同时也对康有为的思见行为作了毫不客气的褒贬：“有为利用尔煦之浮光掠影，钻穴隙于京师名利之场，原不必期其成功，抑或早知其必不成功，以致彼于尔煦失败之后，依旧肠肥脑满，行无所事，不恤大犯清议，悍然屏遗孤而不录，凡此皆有为自行其素，明眼人殊无意严加责备。”章士钊不但有意为“小人物”作传，写出一段被掩饰了的历史的某些真相，还感慨地说：“尔煦虽不幸为宵小所卖以死，然卒以此一死也，而声扬于天下后世，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不然，天下滔滔，流光如驶，就中鸡虫得失，何止亿万，吾究何从就京雒之弹丸剡注而得妄有论列哉。噫嘻！”我的一位朋友，谈了这段旧事后，曾在文章中发表议论道：“小人物由于牺牲而被历史记下，虽然这牺牲也无非被人利用，但毕竟超出了‘鸡虫得失’，浮出了历史的表面。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大人物以思想和见识影响时代，而我们这些小人物就只好以牺牲身家性命留足青史；大人物引导方向，而小人物奉献牺牲。历史大概就是如此。”（见张颐武著《思想的踪迹——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类似问题，值得

思考。从文学史经典化研究的角度,“小人物”应该越来越被淘汰。从文学史整体性研究的需要,“小人物”同样应该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他们的被发掘,被研究,不但可以丰富文学史的现象,开阔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也可以对于一些被掩埋的事实,得到一种历史的承认与肯定。在探索现代文学史的进一步深化和如何走向学科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同样可能提出有启迪性的思考。

这里收入的《从本体到方法——文化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两篇文章,是解志熙对于前些年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热的及时回应与冷静反思。他的意见,当时和现在,都不一定完全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其中的道理,总有一些可以供人思考的东西。他说:“文化批评的流行并不一定意味它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虽然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文化批评的成果,但真正令人满意者并不多。坦率地说,大多数文化批评仍停留在外围和表层,往往给人隔靴搔痒、浅尝则止和笼统雷同的印象,而误用、滥用和庸俗化也并非个别现象。这种情形表明,文化批评在其流行之日即已陷入了危急之时。”他论述了文学乃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批评要植根于文学本体的真实。文化批评在方法论上,要遵循的是具体化的原则、历史性的原则、比较的原则和文学化的原则。他论述了从比较文化到比较文学综合转换中,如何避免这样三种弊病:主观武断、机械教条和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如何保持文学家的文化批评与其他文化批评的差别意识,深入文学的艺术结构和文体形式中的体认和把握,将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与作为一般文化研究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那篇《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强调研究者在文化研究中追求历史更具普遍性、超越性和深刻性的时候,更需对于历史主义的自觉检点,也就是进行文化批评时,把握好

历史研究的分寸感,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非历史而唯文化的错误”。从这个历史性原则的坚持,他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的关于周作人叛国附逆与他文化思想之间关系的一些论述,由于研究者“求深心切”而不适当地夸大文化的独立性、稳定性与超越性而发生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自己严肃的思考与评鹭。对于一些评论者论述周作人叛国附逆的“文化选择”时,所做的超历史、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超伦理的文化分析,或者把叛国附逆的责任,归之于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到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现实,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这些意见,解志熙在为本书所写的“后记”中,已经说明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自己写作此文的初衷。读者可见,此不赘述。

解志熙有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意识。他注意文本,注意文学现象的个别研究,但又能够跳出个别,常以整体观照的历史眼光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一些这一学科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提出面对社会学术思潮的各种热与冷,要保有一种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平常心。如《“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一文,在思考樊骏先生提出的学科“不再年轻但并未成熟”的论断时,提出如何加强思想解放、学术创新,强调研究的当代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同时如何把握好限度,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这样做,不是哪一方取代哪一方,而是如何在这二者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均衡。对于当时强调的学术研究中的当代性与主体性问题,他认真严肃地作出自己的反思,对于克罗齐的历史哲学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质疑。他重新引述樊骏先生所说的话:“问题在于如何将历史主义、历史感与当代性、现实感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任何历史研究都需要解决这样的课题。越来越具有历史研究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这样

的考验。”他提醒,学术研究不要因为无节制的当代性追求反而造成“当代的傲慢与偏见”的流弊。他呼吁,现代文学史写作怎样少一点浪漫主义作风,多一点古典主义的节制,少一些“主观感情的直接宣泄和拐弯抹角的抚时感世”,多一些学术的严肃性和纯正性。他指出,“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这种特殊化的学术心态,事实上一直在引导着我们的研究,使我们无休止地追求着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性及当代性,而不能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它,不能用一种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它。”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化”与“平常心”问题,他的这些思考与意见,我认为,至于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学科发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个学科走向逐渐成熟,主要标志之一,是研究主体能不能够对于这个学科研究者自身的弱点进行深刻的反思。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主体,虽然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整体上看来,与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者的要求,还距离甚大。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少的是冷峻自省和严厉解剖,多的是沾沾自喜和自我陶醉。我们推崇五四启蒙传统,却缺乏启蒙者那种审视一切的严峻与冷静。我们推崇鲁迅精神,却缺乏鲁迅那种解剖自己“露出血肉”来的无情和无私。我喜欢解志熙的为人、为学,多坦率,好直言,但更喜欢他能够将这种为人、为学的品格与学术自省的精神结合起来,对于自己的老师、同辈,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学科研究的整体趋向与态势,常常进行反思性的“酷评”。他评论自己的学术启蒙老师支克坚学术思想的长文,能够在冷静的评述中,注意一种学术坚守精神的肯定,指出一个严肃的学者在新的困扰面前,怎样保持了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家应有的历史主义立场: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对革命文学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历史性局限——尤其是极端政治化的历史局限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他也从不惮于对一些学者在当前文艺思潮、社

会思潮影响下全盘否定革命文学必然性和合理性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提出严正的批评。既不赞成把自由主义文学主张和作品捧上天,也不认同有意无意地把革命文学运动妖魔化,反对新的历史实用主义。难能可贵的是,解志熙也认真地讨论了支克坚这种反思思维的内在矛盾性: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历史的是非得失,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伴随着某种理想化的历史预设,即现实主义历史观与理想主义历史观的矛盾——越是执著于理想化的历史设想者,越是难以理解真正的历史的必然性。

解志熙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如此,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亦如此。以一种宽容的标准衡量各种文学思潮,对于不甚同意的,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和不关切人民生活的,他常做出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舆论与反应于自己如何不利,也在所不顾。《小说艺术的本职回归与德性复苏——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想到的》,虽为一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但也许可以视为他的这种文学关注情怀与美学批评品格的一个象征。他由刘恒的这篇小说,情不自禁地引发出自己对于一些创作现象和批评时风的严峻思考,说出下面这样一些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话来:

“我无意全称地反对知识分子的现代批判意识,但也不惮于指出这种现代的而且据说已经发展到后现代的批判意识具有某种精神病式的偏执。这种病态的偏执一方面使他们有一种天下皆醉吾独醒的自负,以傲慢的知性把人类社会的既往、现在和未来说得漆黑一团,像个无药可救的癌症病院;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以不容置疑的灵性沾沾自喜地向芸芸众生宣告,还有一条聊胜于无的拯救之道,那便是所谓审美的解放之福音。这种从批判到解放的一条龙构想若真能普度众生倒也好了,但据其晚近的理论代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学说来看,普通人实在无福消受,所以它们其实只暴露

了一些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打扮成‘批判的选民’和‘美之福音’的传道者的夸大狂的心理而已。

“我对当前中国文坛的一些先进的批评家和作家也有同感。他们惯于用一种否定一切、唯我独醒的批判意识来傲视社会，不屑欣赏甚至不能容忍普通老百姓有点幸福感，他们从来也不想用一种健康的和建设的态度来看这世界和人生；他们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兜售一种精神迷狂式的以至于放荡不羁的美之福音，却丝毫无意给人们一些健康的伦理启示，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小说与德性无关，在审美自由的名义下为不道德的文学大开绿灯，……

“在竞相渲染罪恶、仇恨、疯狂、暴力和兽性的当代文坛上，刘恒的这篇小说却以如此健康的心态表现普通人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人性，这委实是个异数；并且古人曾云‘欢愉之辞难工’，而刘恒竟能以如此朴素的笔触把普通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写得如此令人心悦诚服，进而使我们发现并且相信在庸常的生活中仍有真实和可宝贵的东西，使我们看到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倒是健全地保持着我们这个民族得以绵延发展的自尊、坚韧、善良和仁义等美好德性。这怎不让人欢喜赞叹呢！”

这是已经很少听得见的真诚而坦率的声音了。

然颇视珍箴，不惮冗长，抄录于是，藉貂以续也。

2002年4月25日，于北大蓝旗营